

从“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到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早期的现代化思想探索及当代启示

杨增崇, 修政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马克思早期探索现代化思想的开端。“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可以概括为“后发国家如何追赶时代”和“如何基于国家的特殊性追求现代化的普遍性”两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基础上成功开拓和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 实现了对马克思“现代问题”思考的承接、丰富、创新和发展。以“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为起点, 将理论眼光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 我们可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解, 更能理解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律及民族与国家特色。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 “德国式的现代问题”

中图分类号: B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5-0173-11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日渐深入,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述中挖掘关于“现代化”的讨论愈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讨论德国人的解放问题时, 同步阐释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1](7)}。在马克思看来, 德国人的解放与德国赶上时代并获得现代性是分不开的。德国人的解放、德国成为“现代国家”的过程, 便是“德国的现代化”。这一问题指向两重蕴意: 首先是“后发国家如何追赶时代”; 其次是“如何基于国家的特殊性追求现代化的普遍性”。诚然,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正经历着思想的转变与成熟, 仅尝试就现代化问题提出自己的设想。但将《导言》中马克思对德国道路的探索与他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东方国家的讨论、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等论述结合起来进行探究, 便可凸显马克思对上述问题的连续性思考。推及今日, 中华民族作为近代以来苦难深重的民族、中国作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后发力量, 在实现自身现代化道路上不但做到了追赶并逐步超越、引领, 而且做到了在遵循现代化普遍规律的基础上葆有了自身的独特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及超越性意义, 《导言》中“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及其丰富内涵是应然的理论起点。

一、马克思讨论“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历史语境及其理论内涵

1843年秋至1844年初, 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并发表在巴黎创办的《德法年鉴》上。在《导言》中, 马克思对德国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集中的讨论, 并点明了“德国式的现代问

收稿日期: 2024-03-02; 修回日期: 2024-05-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路径研究”(23&ZD007)

作者简介: 杨增崇, 男, 云南玉溪人, 法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联系邮箱: yzdong@bnu.edu.cn; 修政, 男, 吉林四平人,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题”(An adequate example of the German form of modern problems^①)。“现代问题”为何必须被讨论?这一问题为何具有典型的(an adequate example)德国特征?青年马克思对这一问题有着特殊的关心,是因为其早期理论视角着眼于宗教批判、黑格尔哲学批判等领域,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当时欧洲的历史大势和德国的社会现实有清晰的认识。对“德国式的现代问题”提出的历史语境进行考察,不仅是对此问题何以成为一个“真问题”的辩护,突出马克思在《导言》时期的强烈问题意识和爱国精神,而且更能开显出“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重要理论内涵。

(一) 历史变局与社会现实的十字路口——青年马克思缘何关注“德国式的现代问题”

马克思最初是黑格尔法哲学的信徒,在获得博士学位后,马克思参与了大量政治讨论活动。一方面,1842年他开始为《莱茵报》撰写政论文章并成为编辑。他在任职期间就莱茵省的经济和法律等问题与普鲁士反动政府展开了激烈交锋。他先后撰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一系列文章,矛头全部指向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同事们一起积极讨论政治问题,尤其是民主国家的问题,已经开始从宗教批判转入政治批判。学界普遍认同,对现实物质利益疑难和贫苦大众悲惨命运的关注使这一时期的马克思逐步摒弃博士期间的唯心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观点,开始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转变。但更为直观的是,工作后的马克思不再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沉思或企图在纯粹思想领域完成对德国启蒙的探索,而是将笔锋直指德国现实——作为德国人的马克思必须首先思考如何解决德国的现实困境。

想要理解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我们绝不能忽略重大历史事件——法国大革命——对他精神的塑造与影响。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看,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以其空前的彻底性震撼了整个欧洲。彼时法国文化的繁荣、经济的发展以及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复杂尖锐使其不但成为各种社会改良运动和变革思潮的“试验场”,更成为马克思理解历史发展和现代社会的不二范本。正如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所评价的,法国大革命是马克思“终其一生,在各种语境下”^[2]讨论的主题。首先,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在1806年至1813年隶属于拿破仑统治下的莱茵联邦,深受大革命的影响,自由主义风气盛行。他在特里尔中学学习期间就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3](前言:1)}更重要的是,青年马克思深感法国大革命的巨大震撼,大革命后的法国是马克思思考现代国家问题的重要参照物。马克思在1843年5—10月写作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中最重要的部分几乎全部围绕法国历史,尤其是关于大革命前因后果的讨论。1843年3月,马克思在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说:德国“爱国主义的空洞和国家制度的畸形”令他感到“羞耻”,这种羞耻乃是一种“革命”,是“法国革命对1813年曾战胜过它的德国爱国主义的胜利”^{[4](5)};在5月的信中,马克思直言德国是“最完善的庸人世界”,“当然远远落在使人复活的法国大革命后面”^[5];9月,马克思再次致信卢格,称自己要“到巴黎去”,称那里是“新世界的新首府”^{[4](6)}。可见彼时法国大革命的余波依旧震颤着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正是在与法国现状的对照下,马克思才悲叹普鲁士的空气会把人变成奴隶^{[4](7)}。总的来看,法国大革命作为人类步入现代历史的重要节点,是许多现代性政治概念的源起,这些概念不溯诸法国大革命便无从谈起;大革命后的法国强力终结了封建专制统治,这场革命虽未能被欧洲国家普遍效仿,但在马克思眼里,仍然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法国是彼时马克思眼中的现代国家,专制的普鲁士全然是它的背反,联系《莱茵报》期间马克思一系列基于德国现实的批判文章,他在写作《导言》时对德国的态度定然是纯粹的揭露和批判。

以上的简要梳理为我们准确理解《导言》中对德国问题的讨论清理出了问题意识甚至是情感层面的地基。在《导言》的开篇,马克思就将批判的枪口瞄准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它不但是德国现实的“副本”,更是马克思眼里德国唯一值得讨论的东西。至于德国的“原本”,即便是完全否定,依然要犯“时代错乱”^{[1](3)}。马克思之所以对德国的现状如此不满,恰恰是因为与大革命后的法国相比,“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处在当代的焦点”^{[1](3)}。

可见,从历史语境的角度看,马克思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天才思想家,之所以在《导言》中萌发这样的问题意识有其自身的理论“良心”和历史必然性。

(二) 时代视角下“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理论价值和双重内涵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6],从时代视角看,“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在现实和理论层面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这一问题的理论内涵和价值是基于其现实价值凸显出来的。从理论价值的层面看,“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彼时德国的情况是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典型(an adequate example)个案,它的典型性首先意味着撇开现代化道路的先行者英、法两国之外,唯有德国面临的困境最为特殊。其次意味着马克思可以通过对德国特殊问题的审视和批判得出对“现代化”问题的一般理解。从理论内涵的角度看,“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具有双重内涵:首先是“后发国家如何追赶时代”,其次是“如何基于国家的特殊性追求现代化的普遍性”。

“德国式的现代问题”所面临的第一重困境便是作为“后发国家”如何追赶时代。这一问题是人类开启近代历史后,一切民族和国家想要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主要问题。马克思深刻认识到,在历史(或时间)这一单向度的强制性力量面前,德国犯的错误是时代上的错误——历史不会倒退,不会给德国与法国重新站回同一起跑线的机会。但是否历史的大门就此向德国关闭了呢?如果经法国大革命所验证的如“人民主权”抑或“自由、平等、博爱”是成为现代国家必须达成的普遍目标,法国的道路是否是唯一的道路?或者是否德国除非重走法国的道路,否则永远无法进入现代社会,追赶上法国的脚步呢?马克思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首先,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就通过大量的阅读、摘要,理清了法国甚至是欧洲各国的社会状况的特殊性,尤其大革命前后的法国作为社会思潮和政党斗争的大熔炉,当时在整个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其次,马克思发现了德国有自己的特殊性。一方面,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是现代国家问题的抽象反映,德国虽然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却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德国历史”^{[1](7)},甚至说“思辨的法哲学,这种关于现代国家——它的现实仍然是彼岸世界,虽然这个彼岸世界也只在莱茵河彼岸——的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思维,只是在德国才有可能产生”^{[1](9)}。另一方面,当法国和英国这样的先发国家进入现代社会时,世界历史就会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新的世界面貌和参照对象,英、法的政治经济学在德国变成国民经济学,英、法的贸易自由在德国变成保护关税制度和贸易限制制度^{[1](6)}。这既是德国落后于时代的表现,又是德国在特殊历史阶段与世界历史交织导致的必然结果。

第二,单向度的历史并不意味着单向度的通往“现代”之路,马克思认为德国可以基于自己的特殊性走自己的道路,并且有可能对先发国家进行追赶和超越。从《导言》的通篇文字和1843年马克思与卢格的几封通信来看,马克思在写作时一定是痛苦的。马克思说:“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1](4)}“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partie honteuse]加以描述”^{[1](5)}，“现代德国制度是时代错乱”^{[1](5)}。但马克思依然秉承着黑格尔式的浪漫,认为“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1](6)},而马克思“现在为德国政治力量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1](6)}。具体来说,马克思在导言中提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1](9)}马克思从自己理解的世界历史必然性中看到了可能性,在对德国现状的绝望中寻找希望。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化”的普遍性不是一个先验的概念,现代化的普遍性恰恰是通过民族国家通往现代化的特殊性体现出来的。历史也向我们证明,基于国家自身的特殊性探寻现代化的普遍性是过往一切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客观现实。

在西方学者看来,西方历史近似于一个“古代—中世纪—现代”的模型,似乎意味着走出中世纪的欧洲便已经逐步获得了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内涵包括宗教解放、理性、自由、个体性和一系

列政治制度的变革等。马克思虽然在《导言》中多次使用“现代国家”“现代的”“现代关系”，也讲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但并未直接提出“现代化”或“德国的现代化”概念。综合马克思的论述，我们可以将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出的“实现一个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的革命”“德国现状[status quo]”等讨论设定为“后发国家如何追赶时代”和“如何基于国家的特殊性追求现代化的普遍性”两大问题，并且通过对马克思写作背景的理解和《导言》文本的重构，捍卫整个“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作为一个真问题的性质。这一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对“现代化”概念的深入思考，更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重要思想基础。“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嬗变、丰富至今的生成性概念，将“现代化”概念定为一尊是机械的和历史领域的唯心主义。

总的来看，青年马克思只身站在欧洲社会历史千年大变局和普鲁士动荡社会现实的十字路口，在《导言》中深刻关注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马克思能葆有这样的問題意识，一方面是对他波恩求学以来学术“问题域”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历史趋势和社会现实的深刻体悟和省察。欧洲文明史在大革命的动荡中被推向现代，德国的特殊地位和现状与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国现代社会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给予了“天才的大脑”以科学眼光来思考人类命运的契机。马克思在《导言》中对普鲁士现状的失望和德国人解放道路的求索恰恰反映了他深爱着自己的国家与民族，这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自有的思想底色。

二、“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作为马克思早期论述现代化道路的典型案例

在《导言》中，马克思不但提出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更论证了德国实现现代化的可能路径，概括起来就是：以宗教批判的完成为前提，指出单纯政治解放道路的不可能性及实现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具体来说，便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指向的现代伦理国家设想的片面性的基础上，指出单纯完成政治解放不是真正的解放，提出只有现实无产阶级解放才是实现人彻底解放的道路。

(一) 批判法哲学作为德国“人的解放”的哲学前提

从马克思的早期写作史看，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盛赞伊壁鸠鲁哲学，将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3](12)}作为自己的哲学格言，认为“对神的存在的一切证明都是对神不存在的证明”^{[3](101)}等，已经展现出自己的宗教批判观点和无神论思想。这种思想萌芽与《莱茵报》时期政治斗争的经历结合，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发表后，马克思在宗教批判上站在了费尔巴哈一边。正如在《导言》开篇就讲：“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宗教是“颠倒的世界意识”，“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1](1-2)}对“天国”的批判已经完成，对“尘世的”“法和政治的”“非神圣形象自我异化”就成了历史哲学的主要任务。既然马克思在《导言》的后文中承认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德国历史”^{[1](7)}，为何完成宗教批判后的德国必须旋即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的国家哲学进行批判？因此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转折，而是马克思体悟理论和现实后的必然选择。从理论上讲，“非神圣形象自我异化”比“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更根本，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原因。黑格尔认为“个体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7]，这里的国家是一种伦理共同体，并且是市民社会的前提。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所理解的法和国家的形式仍然是颠倒异化的。他明确指出，“黑格尔觉得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是一种矛盾，这是他著作中比较深刻的地方。但是，错误在于：他满足于这种解决办法的表面现象，并把这种表面现象当作事情的本质”^[8]。因此，要真正确定“此岸世界的真理”，必须克服思辨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从现实上看，随着1806年普鲁士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遭遇惨败，旋即开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施泰因-哈登堡改革)，这场改革的领导阶层是开明贵族地主，这场改革的结果是君主立宪，黑格尔法哲学的诞生恰恰为德国的政治现实做了哲学辩护。具体来看，黑格尔所论证的

现代伦理国家实现完美的“政治”必须有王权的参与,而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从绝对观念中引申出天生贵族、世传地产等等,等等,引申出这种‘王位和社会的支柱’”是“变了一套戏法”^[8]。

英国从威廉·佩第开始,经由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已然形成了匹配其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发展程度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法国的孟德斯鸠在1748年便提出了“三权分立”思想,1789年的大革命更是将国王推上了断头台。对比之下,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一种对历史进步的“背逆”。但马克思在《导言》中阐发的思想毕竟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之所以将黑格尔哲学评价为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最终的表述”^{[1](9)},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德国历史”^{[1](7)},正是因为彼时的黑格尔哲学仍然是支撑“现代国家”的最完备的理论形态,并且触及了“人的解放”这一核心问题。那么,对这种哲学的批判就是“对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1](9)}。马克思认为,“思辨的法哲学”作为一种关于“现代国家”的抽象理论之所以只能在德国产生,是因为德国哲学“置现实的人于不顾”^{[1](9)},这恰恰反映了“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1](9)}。为什么马克思讲“德国的国家学说的现状就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未完成”^{[1](9)}?正是因为思辨的法哲学在理论上仍然是“彼岸世界的真理”,而现实中“彼岸世界”也在“莱茵河彼岸”(法国)。

(二) 无产阶级革命是真正实现“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必由之路

在马克思看来,思辨的法哲学的缺陷就代表着普鲁士国家机体本身的缺陷,弥补这一缺陷的唯一方法是“实践”。正如前文所述,在单向度的历史面前,德国已经无法与“现代各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因此德国若想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就不能仅满足于与当下的英、法处于同一水准,而是要达到英、法的未来水准,即“人的高度的革命”^{[1](9)}。

英、法两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是“政治解放”,其含义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1](12-13)}。能领导“政治解放”的这一阶级要被视作“社会的总代表”,要能“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在身份上是社会的“头脑和心脏”,在良心上必须“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与这个阶级相对应的阶级——必须有一个阶级被视为革命的反派,必须集中了“社会中昭彰的罪恶”,必须体现着“社会的一切缺陷”^{[1](13)}——进行斗争。简而言之,存在“解放者”和“奴役者”。“解放者”的角色在英国和法国由新兴的资产阶级扮演,但在德国,没有阶级能真正扮演“解放者”这一角色,德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这一点。德国资产阶级改革是一种特殊的由容克地主为主体的封建地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革,它的起因是对法战争的惨败,它的现状是脆弱的新生资产阶级在面对英、法等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时被迫与封建地主阶级绑定,“保护关税、禁止性关税制度、国民经济学”这些对英、法资产阶级像锁链一样的腐朽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1](6)}。因此,彼时德国的现状是不但没有“解放者”,甚至没有“奴役者”——作为后发国家的普鲁士,已经在历史中塑造出畸形的社会形态,单纯寻求“政治解放”已经不可能,实现彻底的“人的解放”是作为后发国家的德国追赶时代的唯一出路。

所谓“人的解放”,这是彼时尚站在费尔巴哈哲学立场上的马克思对德国未来的哲学阐明。德国宗教批判的最大成果在于确立“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历史的目标便开显为“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10)}。彻底完成“法哲学批判”便抓住了现代国家缺陷的根本,为实现彻底的“人的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但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9)},实现德国解放的物质力量指向于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面对着“普遍的不公正”、自身的存在“与现存德国制度存在的前提处于全面对立”的阶级。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个阶级的现状意味着“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1](15)},这个阶级就是

无产阶级。

在马克思看来,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德国人的彻底解放、德国作为后发国家完成对时代的赶超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作为革命物质力量的无产阶级与作为革命精神武器的“批判的法哲学”结合起来。马克思秉承革命乐观精神在《导言》的结尾高呼:“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16)}实现了人的彻底解放的德国,它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1](16)},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实现对“莱茵河彼岸”的超越。以上便是马克思给出的通往现代化道路的德国方案。

(三) “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双重内涵在《导言》中的深刻体现

在前文的基础上重思“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两重蕴意,针对“后发国家如何追赶时代”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导言》中给出了自己具体的设想:德国的无产阶级掌握先进的革命理论,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实现德国人的彻底解放,就能实现对时代的赶超。针对“如何基于国家的特殊性追求现代化的普遍性”这一问题,马克思敏锐地指出了德国在追求现代化道路上的特殊国情。首先,德国是现代化的“被塑造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国家现状决定了德国在与英、法贸易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和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先天发育迟缓。其次,德国的特殊民族历史、地缘环境和政治传统造成的封建势力过于强大、民族统一悬而未决、只能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等因素致使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先天不足”。结果便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寻求加强依附和绑定封建势力,以便寻求在与英、法进行贸易竞争时的均势地位,以上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后天畸形”。当然德国的特殊性不只有劣势的方面,德国自身的优势在于它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是对“现代国家”的理论支撑,对思辨的法哲学加以批判便可以将其作为彻底的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

此外,马克思还提出:“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1](6)}德国想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如英国那样在实现发达商品经济的同时在社会层面形成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协调的政治和文化关系,而法国大革命最现实的贡献就是为商品经济发展粉碎了旧的封建生产关系,这些德国尚不具备的要素正是德国在现代问题上需要追求的目标。因此,透视当时马克思的思想,现代化的普遍本质离不开“人的解放”,现代化的普遍追求在于“经济发展”,现代化的普遍表现是“在社会层面形成协调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路径必须通过革命的实践方式。人类历史客观地证明了,无论是英国资产阶级改革还是法国大革命,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这些目标的实现,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可以走不同的道路。

三、马克思在讨论中国与俄国时对现代化问题的接续思考

马克思在《导言》里提出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并且指明了德国实现现代化的可能路径,但客观现实是德国历史和现代化并未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发展。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就此停止针对“现代化道路”问题的探索,后续最重要的成果体现在马克思对中华帝国^②和俄国通往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之中。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视野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人的解放

1848年的革命浪潮席卷欧洲,但这些革命均以失败告终,尤其是法国革命的果实被路易·波拿巴窃取并复辟了帝制,早年作为马克思心中“彼岸世界”的法国显露出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的倒退和反复,法国式的在实现政治解放的基础上向“人的解放”推进的路径并不顺利。随后,流亡到英国的马克思开始反思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彼时欧洲列强为了化解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再度将侵略触手伸向中国,马克思也将自己的理论视野向东方拓展,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为关注古老的中华帝国如何走向现代的问题。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讨论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不仅对彼时中国国情的特殊状况有较为准确的判断,而且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解放的可能道路做出了预判。马克思认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1](780-781)}。清王朝的腐朽、在应对侵略战争中的惨败、殖民者的剥削不但加速了旧中国的衰落,而且迫使中国被动加入世界体系当中,事实上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此后,中华帝国的一切状况都不同程度地成为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因素。马克思首先关注到了太平天国运动。一方面,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必然使英国商品的倾销市场突然缩小,陡然加剧英国工业增长与市场需求有限之间的矛盾,加速工业危机的来临。工业危机的结局便是爆发政治革命,马克思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783)}在英国的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的虚弱帝国可能因为这场农民起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另一方面,看透欧洲1848年革命种种乱象的马克思惊讶于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展规模、激烈程度和组织力量都远超彼时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潜在市场已经足以让这个孱弱的国家影响世界历史,由中国革命引爆的欧洲金融危机很有可能成为新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事实上,马克思已经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中国革命引发欧洲革命”这样的思想。诚然,这一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资本主义工业危机理论”之上的,但可以理解为马克思对于人类解放道路的崭新思考。

中国人对西方殖民者的反抗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并没有停止,这表明在现实斗争过程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阶级意识和历史觉悟在不断提高。恩格斯发现,相比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人民的麻木与平静,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1](797)}。殖民者将中国人的反抗称为“野蛮”,恩格斯却认为“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1](800)},认同“中国人采取他们通常的作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1](798)},提出“中国人发起全民战争来抵抗”^{[1](797)}的斗争方式。恩格斯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797)}中国的现代化起始于西方殖民者带来的先进生产方式的侵略性促成的传统经济结构的解体,中国人的解放则必须依赖于中国人持续的、规模愈演愈烈的、组织程度愈来愈高的反抗活动,这种反抗最终必然与欧洲革命浪潮交织,成为全人类普遍解放的组成部分。

(二) 马克思视野中的俄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针对“如何基于国家的特殊性追求现代化的普遍性”这一问题,马克思接续的思考体现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里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讨论中。在写作《导言》时,马克思并未给予俄国以特殊关注。如马克思在文中提到“假如德国的整个发展没有超出德国的政治发展,那么德国人对当代问题的参与程度顶多也只能像俄国人一样”^{[1](7)},意味着彼时马克思眼中俄国的发展水平尚没有达到值得他重点参考的水准。但随着理论的深化,马克思愈来愈关注到俄国的特殊情况。马克思指出,不同于欧洲各国已经普遍解体的“古代类型的公有制”^{[9](571)},俄国农村仍然保存了传统的“俄国公社”——一种农民土地公有制,它的具体表现是:“在公社内,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而“耕地仍然是公有财产”^{[9](573)},这是俄国国情的特殊性所在。

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9](570)},从而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这也是西欧国家走进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路径,但马克思“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9](570)}。原因在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基础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9](570)},而俄国农民的土地从未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俄国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力量有自己的后发优势,即无需经历西欧几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商业革命的准备就可以利用西欧国家现代化的成果。马克思认为,“俄国公社”是俄国接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幸存”下来的传统生产关系,与其

效仿欧洲国家以消灭这种旧生产关系为代价,重复踏上那种追求“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对抗的”^{[9](572)}生产关系的道路,不如使“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9](571)}。既然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从而实现公有制,那么俄国实现现代化不应当以消灭这种传统农村土地公有制为前提,而是通过实现俄国农民的解放,“俄国公社”就会“立即被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下”^{[9](571)}。

马克思给出了“俄国公社”走向现代化的可行方案。农民将小块地的个体耕作转变为集体耕作,配合农业机械的大规模使用,实现个体劳动向合作劳动的过渡。国家通过垫款的方式给予农民支持,整个社会则可以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9](575)}。“俄国公社”作为现代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9](576)},这体现的便是“跨越卡夫丁峡谷”之意。

综合前文所述,依据德国、中国和俄国国情的特殊性,马克思在他理论生涯的早期、中期和后期直接或间接地讨论了德国、中国和俄国这三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可能道路。一方面,马克思承认不同的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走不同的道路。另一方面,无论是人的解放超越单纯的政治解放,还是通过彻底反抗来影响世界格局以求摆脱被奴役的命运,抑或是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改造特殊的生产关系以规避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都要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先进成果促进自身发展,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都要完成对旧生产关系的解放,但都不能仅停留在片面解放这一阶段,现代化的最终指向是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可见无论是激情的批判还是冷静的思考,都体现了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一以贯之的社会理想。

四、从中国式现代化看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接承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0]中华民族是在近代历史上苦难深重的民族,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全体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百余年艰苦奋斗,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人类历史上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前文所做梳理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得出更深刻的理解。

(一) 以“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理论蕴涵看中国式现代化

同19世纪前中期的德国类似,中国也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后发国家,同样面临着“后发国家如何追赶时代”这一普遍课题。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哀叹“中国积弱至今极矣”。毛泽东同志用“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诗句来描绘中华民族近代的百年屈辱历史。与德国和俄国不同的是,中华民族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运动被动地卷入现代化历史当中的,中国是马克思口中的“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9](574)},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更加被动。因此,旧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但分享了普鲁士资产阶级那般“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阶级形态,并且凸显出了更强的依附性和反动性。不同于普鲁士资产阶级为参与国际资本主义竞争主动与容克地主国家加强绑定关系,“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11]。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面临着与德国相似且具体的问题——资产阶级无法承担领导解放任务的后发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

中国在通往现代化和自身解放的道路上同样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优势。首先,西方式现代化的内涵中包涵了宗教解放,欧洲的宗教势力过于强大,以至于近代西欧各国开启现代化道路时都必须以宗教批判为前提。在文艺复兴以前,欧洲有丰富的宗教文化、贵族文化,但平民的日常生活则被笼罩在

虔诚的宗教氛围和繁重的庄园劳动之下。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自唐宋以来便逐步完成了社会文化主体的下移,拥有悠久的世俗社会历史和平民文化传统。彼时的德意志是“教皇的乳牛”,而中国古代的宗教长久以来只是作为社会的稳定剂和粘合剂存在,宗教势力从未登上过中国的统治者舞台。因此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无需以从宗教势力的政治和精神统治下解放为前提。其次,德国的现代化还面临着国家统一的难题,彼时的德意志地区有大大小小几百个诸侯国,即便是强大的普鲁士想要完成民族统一也要面临强大的奥地利、法国和沙皇俄国的阻挠,而最终德意志帝国的统一是伴随着普鲁士的领土扩张战争才得以实现的。与德意志地区的四分五裂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单一主体民族国家且有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宋代以后更是连续经历了三个大一统王朝,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人心所向。因此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第二个优势是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有利于现代意义上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推进。最后,中华民族的独特优势还在于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2]中国先贤的哲学思想启迪了欧洲的人文主义萌芽,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加速了资产阶级时代的到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思想,本身就包含了强烈的现代性因素,特别是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会成为中华民族在通往现代化道路和解放道路上的不竭理论宝库,等待着觉醒后的中华儿女发掘和利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先进的革命者迅速寻找到了科学救国方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在《导言》中,马克思怀带着的痛苦情感和愤怒笔锋,而面对国家和民族危局的中国共产党人只会更为痛苦和愤怒。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所面临的局面相较于任何欧洲国家都更为复杂:彼时的中国,没有作为“精神鸦片”的宗教,大江南北的市场上却泛滥着现实的鸦片交易;中国人民没有作为“虚幻幸福的宗教”^{[1](2)}慰藉精神,有的只是现实的极端苦难;整个德国社会被迫“承认和首肯自己之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准”^{[1](4)},落后而不自知,整个中国社会的麻木程度只会更甚;相较于欧洲无产阶级反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实现自身解放的道路上还承担着反帝、反殖民、反侵略的艰难历史任务。

正如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讲:“问题在于不让德国人有一时片刻去自欺欺人和俯首听命。”“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partie honteuse]加以描述”,“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1](5)}事实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旧文化旧思想进行严厉批判,为的就是彻底唤醒国民,而不给旧势力以一丝喘息的机会。马克思在《导言》中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16)}。一旦无产阶级从自己的苦难和遭遇中领悟到自己的阶级本质,就会理解自己的崇高使命,彻底的革命和解放就一定会发生。马克思认同实现现代化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德国未竟的革命事业经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东方得以实现。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就是为了通过扳倒“三座大山”来消灭剥削阶级和旧的生产关系,从而实现无产阶级的翻身解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进程塑造主体和奠定基础。可以说,历史充分证明了近代以来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人的解放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之下才能完成。

(二)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大成就

不同于英、法、德走向现代化是由资产阶级主导,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积极实践“人的解放”的基础上对现代化的全新探索。这种探索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之下的,因此中国现代化道路必然继承了马克思论欧洲“现代化”道路的合理因素;这种探索又是在已经建成

社会主义的先进文明形态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必然有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创新突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0]

具体来看,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讨论中国革命时就意识到了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市场可能给世界革命形势带来的重大影响,但彼时东西方历史进程的序差令他们未曾设想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占世界约五分之一的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这一人口规模超过现有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这一客观因素必然使世界发展形势和人类文明进程迎来深刻改变,“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13]。其次,在《导言》中,马克思批评“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1](9)},资产阶级倡导的现代化只在理论上强调人的自由与平等,却代替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事实上的人的不平等。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0],这是从本质上对资本主义引领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超越。再次,马克思认为现代化的公共目标指向经济的高度发展和人的彻底解放。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践过程中,理解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将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0]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达成的目标,这是对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的最深刻实践。最后,德国现代化的现实道路与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掠夺服务本国资本原始积累的路径如出一辙,又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地缘环境等多种因素,最终走上发动战争的“邪路”并最终酿成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与“和平发展”从以往现代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几乎是“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和伟大实践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和经验,是对现代化理论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14]180年前,青年马克思满怀对德意志民族的深厚情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真思考了“后发国家如何追赶时代”“如何基于国家的特殊性追求现代化的普遍性”两大问题;180年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百年实践和理论创新对这两大问题进行了具有发展性、创新性的杰出回答。当下,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奋斗。

注释:

- ① 关于此处的中文译文,前后有所变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将其译为“现代问题的德国式提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将“German form of modern problems”译为“德国式的现代问题”。
- ② 马克思本人在《俄国对华贸易》等作品中用“中华帝国”指称清王朝,本文中的“中华帝国”均引用自马克思这一概念,理解时应注意与1915年袁世凯预备成立的立宪政体相区分。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5、627页。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2] 傅勒. 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M]. 朱学平,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5.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410.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289.
- [7]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254.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94.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2.
- [11]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4.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427.
- [1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 2021-11-17(1).
- [14]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N]. 人民日报, 2023-02-08(1).

From "German-stye modern problems" t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Marx's early exploration into moderniz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revelations

YANG Zengdong, XIU Zhe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eface to *The Critique at Hegel's Philosophy and Law*", Marx points out "German-style modern problems," which in a sense marks the beginning of Marx's early exploration into the idea of modernization. "German-stye modern problems" can be summed up into the two major issues of "how to catch up with the times for a latecoming country" and "how to pursue the universality of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specificity of the country." The CPC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struggle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has successfully promoted and expanded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fulfilled the inheritance, enrichment, innova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Marx's thinking on "modernization path". Taking the "German-style modern problem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dopting a theoretical view through Marx' whole system, we can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jor proposi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gi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ral laws of the path of modernization and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s and nations.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Preface to *The Critique at Hegel's Philosophy and Law*"; Karl Marx; German-style modern problems

[编辑: 郑伟]